

## 元祐词坛词之功能论\*

刘怀堂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0)

**摘 要:**关于宋词功能,很多论者持遣宾娱兴的观点。事实上,北宋元祐词坛已经在理论上有了与此不同的阐发。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情志兼融论,即词既可表现个人情感、甚至男女私情,也可抒发各种志向或抱负,也可将情与志融合起来抒发个人内心世界。这是一种开放的功能观。二是比兴论,即以诗歌理论来论词的托物寓意,元祐不少词人都有论及。三是温柔敦厚的讽谏论。元祐词人在词的讽谏理论时,把诗歌温柔敦厚的特征融在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功能论。

**关键词:**元祐词坛;情志兼融;比兴;讽谏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2-0053-05

词在产生初期其功能还是相当广泛的。晚唐以后,社会发生剧变,统治者生活腐化,靡靡之词因之而生。许多文人介入词的创作,写了大量“镂玉雕琼”之词,从而将词引向了“用资羽盖之欢”这一狭窄的功能之路<sup>[1]189</sup>。北宋初期,词之功能观探讨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种状况自元丰以后之元祐词人陆续登上词坛逐渐发生变化。

## 一、情志兼融的多元功能论

传统的观点是诗言志而词言情。二者界限分明,不能逾越。早在宋初,就有词人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潘阆或许是较早的词人,认为抒发情感上,诗与词“其间作用,理且一焉。”<sup>[1]191</sup>这是典型的诗词功能相同论,与传统词观迥异。后来的柳永在《瑞鹧鸪》词中提出“缘情寄意”的观点。从柳永的经历和其词作看,他所谓的“情”与“意”已经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举凡男女恋情、仕途失意、羁旅感伤、市井风俗等都在词中宣泄无遗。冯煦说少游词乃“词心”,柳永的《鹤冲天》亦不逊之。他们的理论只是吉光片羽,却超过了其同时代的词论水平,但在当时五代词风笼罩之下,可谓曲高和寡。

随着元祐词人进据词坛,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并有所开拓。其中,黄庭坚的《小山词序》就是一篇重要的词论:“余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中略)至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余少时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于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sup>[1]194</sup>

这是黄庭坚为晏几道词所作的序言。晏几道和苏轼同时,躬逢元祐词坛盛世而词以小令为主,不少论者视之为典型的婉约派言情词人。他亦因此受到其父门生韩持国的批评。当时,元祐词坛由苏轼主盟,而苏轼积极的推行词之诗化革新,内容之一就是力图突破这种单一的言情功能而扩大之。苏轼的词之革新与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是一致的,他的词论多受其诗文理论的影响。他说词“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辞宛转,盖诗之裔”,并进一步说明词乃古人长短句之诗<sup>[2]</sup>。苏轼第一次在词词史上提出了词是诗歌苗裔的观点,是对潘阆、柳永词观的阐发。苏轼努力将诗文的反映功能引入词中,撕开了词坛专主言情的帷幕,显然“小词”已经不能涵而盖之了。这种观点,虽然有

\* 收稿日期:2007-04-18

安徽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2005SK179

作者简介:刘怀堂(1968-),男,河南罗山人,安庆师范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人不理解,如李清照曾在其《词论》中批评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但词迈出言情的狭窄功能,走向更宽广的空间,毕竟是词史的必然。

事实上,元祐词坛对词之诗化革新褒贬不一。尽管如此,在创作中却默默地接受了。王灼曾在《碧鸡漫志》中说此二人在韵制上学到了苏轼的七八成本领。晁补之曾为苏轼诗化革新作过辩护,其词少有艳作。黄庭坚早年词主言情,写过不少艳情词,但自黔南内迁后词风大变。他曾提出“诗者,人之情性也”的文艺观,认为诗是“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并将这种诗论应用到词作之中。“他继承了苏轼的‘以诗为词’而更有发展,他把词视为与诗同样的抒情文学样式,因而在他那里,词境是与诗境相同的,归根结蒂都是其人格的反映。”<sup>[3]</sup>

当然,并不是元祐词坛因词之功能革新就力主言志而反对言情。事实上,元祐词坛对于词的反映功能持一种兼融并蓄的开放态度。词坛上,言情者有之,言志者有之,情志兼融者亦不在少数。我们可以看张耒的《东山词序》:“(方回)乐府之词,……是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泽之工,则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sup>[1]206</sup>这和苏轼、黄庭坚的文艺思想非常相像。“满心而发”,当指抒发各种各样的感情;“肆口而成”,当指不假思索、出口而成;“不自知”词之“粉泽”,指不考虑诗词情志的界限。在这篇词序中他还以项羽、刘邦做比,说世上雄暴之人没有超过这两人的。他们没有儿女之情,但“至其过故乡二感慨,别美人而涕泣,情发于言,流于歌词,含思宛转,闻者动心。为此两人者其岂费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张耒用此二人所歌来比喻贺铸之词作,认为贺铸词是“情发于言”,和刘、项一样“直寄其意”。张耒论词,强调情动于中而发于外,本质上直承诗歌理论而来。他的词论体现了元祐词坛创作上的特征。从这些词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元祐词人并不反对言情,只是反对露骨的色情描写。苏轼之批评秦观、法秀之批评山谷都是为此。他们自己也写有不少感人的言情词,后世也多有苏轼言情词恐柳永也不能写出的评价。其词论体现出情志融合的倾向。

从元祐词人的词作看,纯粹言情或言志的,倒不是主流。元祐词人的词作中很难分清是言情或者是言志,往往将二者融合在一起,以抒发内心“幽翳”之情。例如秦观,被视为艳情词的高手。

他是苏轼最得意的弟子,曾因学习柳永写“山抹微云”等香艳扑鼻的词而受到苏轼的批评。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曾对李廌说他“自以(文章)华弱为愧”<sup>[4]</sup>。他虽然没有具体的词论留给后人,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与后世的评论中探寻其词之功能观。张耒、晁补之对此有过评论,说少游“诗似小词”;而他们在评论苏轼时说其“词如诗”。表面上看,这师徒二人在对待诗和词上有差别,实际上却是走着同样的路子。秦观是用作词的功夫来作诗,苏轼是用写诗的心思来写词,两人都将诗与词贯通起来,以抒发情志。从张、晁和清人周济“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的词论看,秦观是有意识的接受了元祐词坛关于诗歌言情言志的理论:将言情与言志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赋予艳情词以新的特质,取得了很高成就。

从上面论述中可以看到,元祐词坛对词的功能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那么,黄庭坚的词序就有了依据。他是元祐词坛中的一员,与元祐诸词人相知相契,对他们的经历、秉性、词作倾向莫不谙熟,因此在为晏几道词作序时,将其对于元祐词坛关于词之功能的这些见解,自然的形诸文中。在这篇词论中,首先,他将“狎邪”之乐府比为“大雅”、“鼓吹”,甚至是豪士之言,这与苏轼“非小词”的观点不谋而合。在黄庭坚之前,论者只是对词的功能作概括的论述,而黄庭坚则具体的比之为“大雅”、“鼓吹”。大雅是《诗经》中风、雅、颂的内容之一,而鼓吹的内容更加广泛,虽从词的雅俗风格上立论,但也反映了黄庭坚对词的功能的见解:词也可以具有类似于大雅、鼓吹的各种言志、言情功能。其次,言情词中可以言志,这是情志兼融的功能论。如其所举“洛神”之典,我们比较熟悉。晏几道官宦出身却被视为有才无德,黄庭坚称其“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模”却沉沦下僚。晏几道在自己所作的词序里也说过“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的话,那么,“洛神”云云,其中未必没有借这个凄美的人神恋情故事,来抒发类似于曹植的怀才不遇之感。这与秦观融身世于艳情之感是相同的。最后,黄庭坚的“桃叶、团扇”之论,表面上似为自己辩护,实质上还是主张词可以反映世俗男女之情的。不过,如对“桃叶、团扇”之典进行推考,词类艳情词背后却也寓有屈原怀才不遇的美人之托。据上,元祐词坛关于词的功能论有三个方面:言情、言志或情志兼融,这是一种开放的多元功能论。应当说,黄庭

坚的序论还是比较切合词坛事实的,它对元祐词坛词之功能论作了初步的提炼和总结,是对苏轼词论“诗人之雄”的具体阐释。刘熙载曾用“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sup>[5]</sup>来评价苏轼词,将其用来概括元祐词坛功能观亦无不可。

## 二、词之比兴论

元祐词坛词之比兴论主要体现在《演山居士新词序》中:

“演山居士闲居无事,多逸思,自适于诗酒间。或为长短篇及五七言,或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舞蹈以致其乐。因言风雅颂诗之体,赋比兴诗之用,古之诗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含思则有赋,触类则有比,对景则有兴,……。”<sup>[1]201</sup>

演山居士即黄裳(1044-1130),神宗元丰进士,曾官福建知州,端明殿学士,哲宗时权礼部尚书,是一位和苏轼同时代的长寿文人。他历经整个元祐词坛并对之耳熟能详,这篇词论虽以正统诗论论词,但应是当时特定风气下词的功能变化的概括。实际上,词之比兴寄托问题,历来都有争议。不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不可能孤立于其所处的时代之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文人对所处时代的看法。词也不例外。在宋初,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晚唐温庭筠时代,词中就有了比兴寄托,但理论阐发的不多。到了元祐词坛,除黄裳外,零散的理论还是有的。黄庭坚曾在《跋王君玉定风波》中说:“王君玉流落在外,转受七郡,意不能无失望,然终篇所寄,似为执政者不悦而独怜耶?”<sup>[1]203</sup>他明确指出了王君玉的《定风波》词有所寄托。他本人词也是如此,李之仪在《跋山谷二词》中就谈到了这种情况:山谷外放当涂,“其章句字画,所留不能多,而天下固已经交口传诵。(中略)事固有幸与不幸者,其来已久,足以见称于有托。”<sup>[1]201-202</sup>李之仪虽然是评价黄庭坚词,未尝不是黄庭坚词引起了他的共鸣。李之仪在给吴思道词作跋时,具体谈到了比兴寄托的问题。他认为,词的寄托当放在词的结尾,这样可卒章显志,要做到言尽而意不尽方是妙境。黄、李二人都认为词中有寄托,并提出了一些见解。如果从词作上看,元祐词坛的确存在着比兴寄托的倾向。如苏轼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词,刘乃昌说此词用佳人比兴来寄托作者政治失意之感<sup>[6]</sup>。贺铸也是一位精于比兴寄托的词人。他提出过“比

兴深者通物理”的诗论<sup>[7]</sup>,但夏敬观认为这正是贺方回作词的诀窍。他曾自云:“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sup>[8]</sup>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李商隐,诗歌以含蓄朦胧、主旨深邃知名当时与后世。贺铸如此青睐他们,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诚如后世学人所说,其内心自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这样,其词论就是其创作的总结。难怪有人说其《青玉案》就是一首寄托幽邃之词:它表面是“抒写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感慨,纵深层次则是词人政治理想破灭后生活情操的写照,依然渗透了词人的理性精神”<sup>[9]</sup>。后世词学家还将他和周邦彦相提并论。王灼曾云:“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sup>[10]</sup>。”

黄庭坚、李之仪、张耒、贺铸等从词论的角度明确阐释了词的比兴论,并在创作中实践着。可见,元祐词坛上的比兴,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条巨大的潜流。黄裳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首先,他明确指出了用以比兴的对象,即“含思”之意、“触类”之感、“对景”之悟,这些都可以为词人所用。其次是指出了比兴的作用,即借比兴“吟咏以舒其情”。他使用“舒”字而不是“抒”字,表明比兴目的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抒),在更高的层次上是获得情感上的愉悦或享受(舒),比潘阆、贺铸等人的理论要前进一大步。最后,对于比兴之“情”作了阐述。这种“情”可以是主体的“逸思”,也可以是“古之诗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黄裳的词论,无论从比兴对象涵盖之广泛,还是比兴层次的提高或比兴之情的诗化,都比上述几位词人的概括要具体得多。

詹安泰先生云:“北宋真、仁以降,外患寝亟,党派渐兴,虽汴都繁丽,不断歌声,而不得明言而又不能已于言者,亦所在多有;于是辞在此而意在彼之词,乃班秩以出。”<sup>[11]</sup>斯言诚是。

## 三、温柔敦厚的讽谏论

苏轼曾提出词乃“诗之苗裔”的观点,但他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词之讽谏特征。苏辙曾在《东坡先生墓志铭》里评价苏轼,说他看见对老百姓不利的事情,虽然不敢言言但也不敢默视。他往往本着诗人的良心,在诗歌里托事以讽,希望能够引起朝廷的重视。乌台诗案后,他的部分词作也渗透着这种精神。如《南乡子》(寒雀满疏篱),以寒雀为喻,讽刺当时社会上投机钻营之徒。他甚至在《蝶恋花》借张衡骂曹——“掺鼓渔阳撼未遍”

这一典故,来抨击当局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元祐词坛上以专文形式来阐述词的讽谏论的,是与苏轼同时代的黄裳。

《演山居士新词序》云:“……以言乎德则有风,以言乎政则有雅,以言乎功则有颂。采诗之官收之于乐府,荐之于郊庙,其诚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其理可以经夫妇、移风俗。……以其主文而譏諫,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然则古之歌词,固有本哉!”<sup>[120]</sup>这本是诗歌的专利,黄裳显然是把《毛诗序》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sup>[12]</sup>用在阐述元祐词坛的词论之中。

黄裳主张词的内容应该“言德”、“言政”、“言功”,起到“经夫妇、移风俗”作用。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但用来论阐述词的功能就另当别论。元祐词人如黄庭坚、李之仪,甚至周邦彦都有或多或少以词讽世的词作。如黄庭坚词“特地干戈相待、使人疑”(《南柯子》),委婉讽刺党争的激烈与残酷。周邦彦《蝶恋花》(爱日清明新雪后)五首词,罗忼烈先生认为其皆托物指刺,其旨在赵佶、蔡京。相比而言,李之仪的《雨中花令》(休把身心搵就)、《万年歌》就过激一些。这两首词语言犀利,情感激烈,矛头指向上层统治者。这些词人,除了李之仪言辞愤激外,其他词人相对比较含蓄。就当时政治环境而言,词人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而黄裳的这一阐述,正是元祐词坛的写照。

不过,黄裳所论的移风易俗,其前提是颂德政,这就使词的讽谏有所约束。因此,这种讽谏其效果微乎其微。这可从词坛没有文字狱得道证明,而这恰恰反映了黄裳讽谏论的核心——温柔敦厚。词不仅仅反映个人情感或愤懑,更应以政教为主要内容。元祐词人均受儒家思想熏陶,也都有入世济时的抱负,其为文莫不渗透了儒家强烈的进取精神。纵观元祐词作,除部分艳情之作外,多数还是有感而发。即使粉饰太平之词,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元祐词坛词作内容大多含蓄,即使涉及时事也是如此。这种委婉的表达正是诗歌温柔敦厚特征的体现。他进一步提出,词要以《诗经》的风、雅、颂为标准,这就把言情之词正式纳入诗歌的范围。这不仅是内容的问题,还有词的功能所指。《诗经》是儒家化了的经典,为历代王朝服务。其“风”使人主得以观民情而知政事之得失,其“雅”、“颂”则是歌颂朝廷之德政。这必然要求诗歌内容中正和平,以体现太平气象。所以,词不能仅仅抒发个人之愤懑,应

有《诗经》之功效,所谓“其诚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其理可以经夫妇、移风俗”。

从黄裳的词论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不主张词中讽谏,而是要遵循温柔敦厚这个度。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像诗歌一样“主文而譏諫,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是整个词论的宗旨。它和温柔敦厚联系密切:温柔敦厚是核心,主文譏諫是表象。尽管以词讽世是词的指归,但它最终还是限制在温柔敦厚的范围之内。黄裳曾在《书乐章集后》中也申述了这一观点。他说,他读柳永的《乐章集》,喜欢其能描摹嘉佑之太平气象,就如同读杜甫诗;柳永的词作,是词人盛世之醪藻,不能缺少。这里,他将词人和词作都纳入到为盛世歌功颂德的政教范围之内。他推崇柳词,将柳永词比成杜甫诗,不无溢美之词,但黄裳看重的是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特征。这种特征正是温柔敦厚的典型代表;柳词能歌太平气象,则是温柔敦厚的另一体现。两者形式不同,维护政教的本质则一。所以,即使要讽谏,也要遵守温柔敦厚的至高原则。黄裳的观点在当时并非空谷之音。神宗时人陈暘在《乐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古代乐章,或以讽谏,或导性情,都是有感而发。这种论点,实际上是承接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而来。陈暘认为乐章可以讽谏,可以写情,但必须“欲声调而四时和,奏发而万类应”,“含章帝思,彬彬可述”,做到“纯乎中正之雅”。陈暘从音乐雅化的角度来论述乐府,其立论的核心和黄裳不谋而合。元祐后期文人朱翌也认为古无长短句,都是歌诗,和《毛诗》一样,连李白的《清平调》也是绝句诗。而《毛诗》是儒家重要典籍之一,其序言中阐述的观点和《诗经》一脉相承。这样,朱翌的立论尽管是从反对当时流行的淫声出发,却也表明了其词学观点,即强调乐章不可超出“中正之雅”这个底线。所以,主文譏諫不能超出“温柔敦厚”应有之度。尽管这个观点受到后世学者的批评,但的确是元祐词坛创作实践的反映。

客观地说,元祐词人在词的功能理论进行了探索,但并没有形成体系。我们不能苛求元祐词人,这是词史演进的必然。谢桃坊说:“宋人关于词体的纯审美和纯娱乐的观念,在北宋中期开始受到儒家政治教化说的干预和渗入而渐渐有所变化。”“这段时期,儒家政治教化说向词体观念的渗入已具必然趋势。”<sup>[13]</sup>元祐词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元祐词坛在功能论上的缺憾。

## 参考文献:

- [1] 张惠民. 宋代词学治资料汇编[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 [2] 苏轼著. 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943.
- [3] 黄宝华. 论黄庭坚词[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9): 73 - 78.
- [4] 丁传靖. 宋人轶事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658.
- [5]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08.
- [6] 刘乃昌. 苏轼词学论文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154 - 160.
- [7] 白敦仁. 周邦彦词赏析集[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8: 254.
- [8] 夏承焘. 唐宋词人年谱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73.
- [9] 诸葛忆兵. 徽宗词坛研究[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204.
- [10] 岳珍. 碧鸡漫志校正[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36.
- [11] 詹安泰. 宋词散论[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64.
- [12] 郭绍虞, 王文生. 中国历代文论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0.
- [13] 谢桃坊. 中国词学史[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2: 22.

## On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YuanYouCiTan

LIU Huai - tang

(Literature School of Anqing Teachers Colloge, Anhui Anqing 246000, China)

**Abstract:** Many scholars regard SongCi as a kind of entertainment, but different views from theirs came out in YuanYouCiTan. They developed Ci's function in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was free expression of romance with ambition together. Personal feelings including illicit love, personal ambition or both of them could be expressed in Ci. Which was an open standpoint. The second was implied meaning, which was discussed by a few writers in YuanYouCiTan. The last was satire society, which was linked up with the poem theory of moderation. And then a special theory came out.

**Keywords:** YuanYouCiTan; expression of romance and ambition together; implied meaning; satire society